

当前美墨关系面临的挑战

[墨] 西尔维娅·努涅斯·加西亚 曼努埃尔·查韦斯

内容提要 美墨关系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两国关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模式。美墨之间传统的地域关系深嵌于两国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中,但又超越了边界问题,由于两国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而不存在简单的解决之道。美墨交流在不断加强,互相影响的力度也与日俱增,但彼此在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印象,却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双方的相互交流与理解造成了障碍。价值观与传统是理解民族认同运行方式的核心要素,也是美国和墨西哥在社会层面上深入探讨合作方案的基本问题。国家间的互动不应仅仅停留在商品与人员交流的层面上,还应该将文化价值观的交流纳入其中。

关键词 美墨关系 文化价值观 移民问题 公共外交

一 引言^①

分析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首先需要认识到两国都有着自己的特定历史。美国和墨西哥不但起源不同,而且拥有的历史遗产也截然不同。从殖民地时期到摆脱枷锁成为独立民族国家阶段乃至现在,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上的诸多差异凸显了两国彼此的误解,使彼此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

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未步入坦途,个中缘由可能在于美墨两国都珍惜自己的民族尊严,都拥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前者在追求权力和主导地位中发现自我,而后者则致力于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歧视。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詹姆斯·N. 罗西瑙所说的“遥远的近邻”,这使得它们成为今日国际关系的“社会实验室”。^②

尤为重要的是,目前对于美墨关系障碍的缘起仍无一致的看法,是始于19世纪中期还是始于二战之后,尚有待于讨论和学术上的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始向纵深发展。彼时,伴随着两国间商品和人员流动的大大加速,边境成为两国关系议程中的重点。^③与此同时,美墨关系也成为最早推动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崭新力量。

当前,美墨之间传统的地域关系深嵌于两国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中,但又超越了边界问题,由于

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而不存在简单的解决之道。同时,形成中的北美经济区影响着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及频繁互动,需要两国政府和民间同时予以关注。上述因素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后果,即各种解决美墨边界问题的想法均在争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例如,一些人倡议取消两国边界,而另一些人则支持建立边界隔离墙。

美墨关系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两国关系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边界任何一方的决策都会立即在另一方产生明显的反响。美墨关系的内容无所不包,既包括诸如能源、贸易与运输等正式的议程,也涵盖非正式的实际议程,诸如规模空前的移民、毒品走私、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自然资源争端、影响力渐增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等。

两国关系一度颇为密切(特别是在乔治·W. 布什政府初期),展示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前景。然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前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把国家安全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政府的绝大部分精力已从地区问题转向阿富汗和伊拉克。

尽管美墨交流在不断加强,互相影响的力度也在与日俱增,但彼此在心理和意识形态上的刻板印

^① 标题为译者所加。

^② 詹姆斯·N. 罗西瑙 (James N. Rosenau) 教授在世界政治动态、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影响等学术领域享有盛誉,撰写了35部著作及大量的论文,其中包括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in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奥斯卡·马丁内兹 (Óscar Martínez) 在其编写的一部著作引言中,对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基准点问题做了介绍,可参见 *The U.S. - Mexican Borderland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Wilmington, Jaguar Books/ Scholarly Resources, 1996.

作者简介: 2011-09-01

作者简介: 西尔维娅·努涅斯·加西亚 (Silvia Núñez García),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北美研究中心主任, 终身教授; 曼努埃尔·查韦斯 (Manuel Chávez), 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新闻学院教授。

象，却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对双方的相互交流与理解造成了障碍。

根据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的解释，一种文化对待另一种文化有三种方式：（1）敌视其他文化，然后借此挑起战争；（2）鼓吹孤立主义，构筑防卫线；（3）构建文化交流与对话之桥。^①

美国和墨西哥已从双方的战争与冲突中吸取了教训。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彼此间刻板印象和迷思的加强，两国很难克服互不信任的状态。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想象的威胁，依然使得两国产生了种族中心的观念，而一旦这些观念成为现实，人们将无法意识到两国人民都同属多样化的、平等的人类。

考虑到许多研究已从政治、经济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美墨间的自由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起源及其现实意义，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对人的因素的研究。对文化和社会的深入分析，似乎应该成为美墨关系研究的下一个步骤。价值观与传统是理解民族认同运行方式的核心要素，当然也是美国和墨西哥在社会层面上深入探讨合作方案的基本问题。

倘要克服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两国需要认识到，国家间的互动不应仅仅停留在商品与人员交流的层面上，还应该将文化价值观的交流纳入其中。雷蒙德·罗科教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他提出“美国和墨西哥都需要新的治理形式，以应对全球化、跨国化和移民等相关进程对两国产生的各种层次的相互依赖。”^②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这不仅对两国边界地区产生了人口学意义上的影响，而且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文化模式，即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传统与价值观导致了“文化杂合”现象的产生。^③根据卡普钦斯基的研究，由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交流互动无可否认，两国已形成的互为镜鉴的关系是有可能得到解释的。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美国和墨西哥都同为民主社会，各自的公民都有选择的自由。所以，要促使彼此间的负面看法向积极的一面转化，首先需要两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意愿，即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无可避免的。然而对美国和墨西哥而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两国可能无法达到肝胆相照的阶段，即实现卡普钦斯基所谓的不同文化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双方的了解、相互的尊敬以及开展对话，来消除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某些无法消除的冲突所遗留的残余。

二 美墨关系的范围及其特征

现在，美国和墨西哥逐步认识到两国关系中如下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国内议程的作用及其分量，本地需求的动态变化和与国际协定的相关性。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内，以上三个因素对两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不尽相同。事实上，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中，其中一个国家制定的公共政策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可能是对所有的三个因素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另一个国家却可能仅仅依据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因素，来制定自己的公共政策。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两国关系的难点都在于，如何确保一国制定的种种政策要与其邻国的补救措施相协调。

这些问题在美墨关系议程中居于前列，并仍将在墨西哥的公共政策中占有优先地位，也将继续成为美国公共政策的关键。根据其重要程度，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1）高级优先领域，包括边界和后勤安全，航海和海洋安全，反恐情报共享，移民，在毒品资金、银行、军事与法律执行等方面开展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2）中级优先领域，包括能源、贸易、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健康与食品安全，加工制作，经济部门的协调与紧急状态管理；（3）低级优先领域，包括教育、科学合作、家庭团结、儿童保护、劳工和人权、地区及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当然，这些议题并非囊括了全部，只是表明相关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而且，每一个合作领域又可以细划为许多更具体的议题，尽管两国在这些议题上也许无法进行合作。

美墨之间的移民问题是一个焦点，它在两国之间的论争中具有代表性。当美国执行移民政策、实行移民控制的时候，在美国的许多社区排斥拉美人之风愈演愈烈。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对此憎恨不已。由于无视两国间存在着十分活跃的劳动力市场，移民改革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美国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农业、服务业、建筑业和酒店业）的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尖锐，仍将

^① 关于“其他文明”的观念是如何建构的，卡普钦斯基在书中有详细的介绍，参见 *Encuentro con el Otro*, Barcelona, Anagrama, 2007.

^② 雷蒙德·罗科（Raymond Rocco）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研究专长为政治学理论、种族关系和种族与政治。

^③ Ryszard Kapuściński, *Encuentro con el Otro*, Barcelona, Anagrama, 2007, pp. 24 - 25.

继续依赖移民。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旧金山、芝加哥、休斯顿、达拉斯、迈阿密和纽约等地众多墨西哥移民联盟的关注。移民们走上街头示威，新闻媒体也在黄金时段报道了移民的生活与工作条件、移民的力量，以及移民们所具有的人性的一面。^①然而，布什政府支持的移民改革提案，却是一个国会政治两极分化的牺牲品，从一开始这项提案就因未能得到国会的足够支持票而未成为正式的法律。

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内安全政策后，其边界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以法律执行、情报与反恐措施等来增加美国的安全和团结。^②由于美加墨三国是全球人员和商品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这些政策对美国的两个邻国都产生了影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每天在美墨边境进行约百万次的检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措施的首要目标是威慑潜在的恐怖主义，但同时也有着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的意图。这种新的国家安全模式是无从争议的，但由此而衍生的项目和倡议却能够通过两国间的公开合作加以调整。

同样的，贸易和运输在两国经济中都居于优先地位。每天近 10 亿美元的贸易额关乎两国诸多行业，如农业、电子、纺织、交通、汽车配件、家电和石油等。货物和服务流动也是两国近 20 年来经济相互依存的一大见证。如果两国经济未遭受致命创伤，那么北美完全融合的经济体就不可能分裂。

尽管美加墨三国彼此间的双边关系困难重重，而且存在着盲区，但三国签署的“北美安全与繁荣伙伴计划”（SPP，2005 年）意义重大，反映了合作对三国的重要性。三国的联邦政府制定出了一系列安全与繁荣计划，以协调双边与三边关系。安全的目标主要是控制边界地区人员流动、海空交通以及北美地区的总体安全。如上所述，这些计划不仅是要打击恐怖主义，还包括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繁荣的目标则是深化北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确保人员和商品的流动不因受到威胁而中断。此外，繁荣计划也推动各个经济部门间进行更好的合作，例如能源、钢铁、交通、农业、卫生和环境等。

然而，一般公众获得的有关 SPP 的信息却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彼此充满敌意的社会公共环境，这种情况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信息失真阻碍了 SPP 进一步发挥其潜能，也成为两国开展复杂公共外交的充分理由。

进一步讲，随着美墨关系日益密切，我们确

信，两国要实现充分的理解，就必须相互学习，增进了解。我们不仅应该在课堂或者政治舞台上做到这一点，还应该在家和各自的社区中身体力行。

三 美国和墨西哥关系的未来： 乐观主义的迹象？

我们相信，美墨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以下三种可能的情景假设：第一种是悲观假设，特点是布什政府时期放弃拉丁美洲，特别是退出墨西哥的行动；第二种是乐观假设，这是包括工商联合会在内的美墨经济部门所力主的；第三种介乎前两者之间，假设双方都认识到它们在经济领域和领土空间中享有太多的共同利益，所以都不愿意失去这些利益。

悲观的情景假设基于两国主导退缩和孤立主义的国内意识形态。如果上述主张持续扩展，本已黯淡的前景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掌控。退缩和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行动都会损害两国关系和合作精神。乐观的情景假设是由如下因素促成的，即经济力量的强度、持续的学术交流、两国间稳定的社会和文化交流以及大量侨居墨西哥的美国公民。^③两国关系的第三种情景假设则是一个明显的可行性情景，即它试图对双方关系中重大而又深刻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案主要集中在解决当前两国关系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在未来数年中将继续存在。

本土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以及遍及美国各地、似乎无休止的公开歧视，构成了激进的反对力量。在美国各地，出于对拉美人的仇恨而导致的犯罪数量在不断增加，仅在 2006 年就有 819 名拉美人成为此类犯罪的受害者。^④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提出了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观点，而一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电视和广播

^① 兰德尔·C·阿奇博尔德 (Randal C. Archibold) 在《纽约时报》头版中报道了这次游行，参见“Immigrants Take to U. S. Streets in Show of Strength”，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6, A1.

^② 《今日美国》(USA Today) 推出了系列报道，全面分析了美国出台的这些反恐安全措施及其对美国公民权力的意义，参见“Intelligence Bill Also an Anti-Terror Catchall and Legislation Set Stage for Uniform Driver's Licenses”，in *USA Today*, December 16, 2004.

^③ 美国副国务卿查尔斯·夏皮罗 (Charles Shapiro) 指出，在墨西哥居住的美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多。这类群体包括退休人员、行政机关和企业员工及其家属、企业家、投资者、学者和学生。参见 *25th Workshop for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Miami, Florida, May 4, 2007.

^④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 2006*, Washington D. C., FBI, 2006.

评论员,如美国有线电视网的卢·杜博思、福克斯电视台的比尔·奥莱利和广播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就经常把亨廷顿的这些观点奉为圭臬。对美国墨西哥来说不幸的是,这些破坏性的力量似乎要在这段时期内处于领先地位了。

当然,两国间的双边措施是有机会获得成功的,例如美墨边界地区州长会议、北美发展银行行动和环境与卫生双边委员会。美墨边界地区州长会议似乎引发媒体和政界的关注,足以对地区与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但数次会议后,其收效甚微。同样地,两国政府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公共外交。至于公共外交的角色,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促进了解、相互尊重与合作的一种工具。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践行此类公共外交,在美墨关系中践行公共外交,使其成为双边关系的永久特征。

两国公民在公共外交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例如,可以证明,美墨边境地区许多有组织的社团机构有助于两国增进了解。这些机构通常会选定一个特定的目标,如环境保护,这样它们就逐步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所以,在这个创造双边合作的新时代里,沟通是核心战略。

最后,外交官也有必要利用媒体,这样可以确保民众对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决策获得正确的信息。然而,华盛顿的许多高官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鲜少努力减少信息失灵和信息闭塞的发生。而他们这么做又会被社会解读为“保持中立”。墨西哥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也是如此。他们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很少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及报纸上抛头露面。然而,新的现实要求每个国家的官员从所谓

(上接第26页)

在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保护的进程中,不对称问题日益加深。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分享的潘塔纳尔湿地,维系着拉普拉塔流域的生态系统,也是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农业生产的水源地。水资源的财富储藏相当于一种权力。如果本国对其不加保护,它就会成为外国贪婪和干预的对象。保护自然,与享乐型的现代化反向而行,它使巴西摆脱了“永远是未来强国”的咒语。从亚马孙到阿根廷南部的冰川,经过残余的大西洋沿岸森林,最终到达拉普拉塔河,与水相关的地缘政治应更加明确,防患于未然,在解决水资源被滥用带来严重后果之前,做好预防工作。

南共市和亚马孙合作条约并没有成功,并伴生着

的“中立”转向责任。两国交往的强度之高是无可否认的,它需要国家、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全力关注。

在这个信任不断消退的时代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方式,既可为解决两国面临的挑战指点迷津,也能为两国建立新的交往机制出谋划策。这是推动两国迈向持续对话的一个步骤。最终,我们宁愿看到两国关系虽然风险重重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而非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困境。

主要参考文献

1. Randal C. Archibold "Immigrants Take to U. S. Streets in Show of Strength",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06, A1.
2. Jorge I. Domínguez, Rafael Fernández de Castro,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Between Partnership and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 2006*, Washington D. C., FBI, 2006.
4. Ryszard Kapuscinski, *Encuentro con el Otro*, Barcelona, Anagrama, 2007.
5. Óscar Martínez (ed.), *The U. S. - Mexican Borderland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Wilmington Jaguar Books/Scholarly Resources, 1996.
6. Alan Riding, *Vecinos Distantes: Un Retrato de los Mexicanos*, México, Joaquín Mortiz/Planeta, 1987.
7.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in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Andrew Selee,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More than Neighbor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10.

(翻译:陈迎春;校订:岳云霞;责任编辑:鲁渝)

错误的重点目标。人们对这种外交失去了希望。受自私自利的影响,多边努力日渐式微。对于观念的模糊认识,例如保护责任、干预权利、有限主权等,使人们的理念更加混乱。这些理念没有唤醒人们的关注,即应当对气候变化中的外交治理进行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1. Júlia Adão Bernardes, Freire Filho, *Geografia da Soja: BR - 163 Fronteiras em Mutação*, Rio de Janeiro, Arquimedes, 2006.
2. Mohamed Larbi Bouguerra, *As Batalhas da Água: Por Um Bem Comum da Humanidade*, Petropolis, Vozes, 2004.
3. Christian G. Caubet, *A Água Doce nas Relações Internacionais*, São Paulo, Manole, 2006.

(翻译:余知名;校订:吴志华;责任编辑:刘维广)

and high frequency of flood reflect the impacts inflicted by climate change on South America. Water resources become scarce in the Andean mountains, which take a toll on the regional countries including Bolivia, Peru, Ecuador, and Venezuela, Columbia. As a result of land clearing for pastureland, deforestation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rainforest has increased sharply, which leads to the shrink of water volume of the Amazon River. Growing water scarcity problems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uses of water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policymakers in South America. But, as a result of asymmetry 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global common interests, regional countries don't full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jointly developing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Argemiro Procópio)

Current Challenges of the U. S. –Mexico Relations (pp. 27 – 30)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not only have different origins but very distinct heritages. Their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is currently embedded in numerous, complex matrices that go beyond the border itself. These issues ar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and offer no simple answers. As interactions and day-to-day presence have increased, the psychological and ideological forces of stereotyping regained ground and showed their impact by impeding full mutual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deepening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appears to be the next step forward for this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tage of self-centered cultures, the two countries need to recognize that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 surpasses the exchange not only of goods and people, but of cultural values.

(Silvia Núñez García, Manuel Chavez)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Program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p. 31 – 36)

A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program is a cash-transfer scheme esta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senior citizens. Universal pensions are available to everyone of eligible age, regardless of income, assets or employment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regional countries had made sustainable and rather successful effort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non-contributory pension programs. An effec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operation cost is well-managed to meet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se programs have large positive impacts upon a wide range of variables. It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that they play a key role in reducing poverty among the elderly and their households.

(Tang Jun)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Chinese Theaters in Cuba (pp. 37 – 42)

In the 19th century, there emerged to be a Chinese community in Cuba as a result of continuous inflow of Chinese immigrant labors. In 1873, the first Chinese theater was established in Havana. Since then those theaters run by Chinese gained a sustained development, presenting the puppet show, the Guangdong opera and movies. They served as the place of entertainment for local Chinese immigrants meeting their strong demand for homeland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in Cuba. In addition, they also functioned as the gathering location for those immigrants to raise funds for public welfare and affairs.

(Yuan Yan)